

生态位建构何以把实践置入自然中?

——基于劳斯自然文化进路的阐释

How Can Niche Construction Place Practice into Nature: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Rouse's Natureculture Approach

杨思问 / YANG Siwen¹ 张毓芳妃 / ZHANG Yufangfei²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学院, 北京, 102488; 2.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8)
(1. School of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2. School of Marxism,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8)

摘要: 20世纪实践转向所诉诸的实践概念存在如下问题: 实践被视为外在于自然的社会性实践, 且无法对其自身的维持和分化进行说明。生态位建构理论提供了一种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的互构演化视角, 这启发我们把实践理解为人类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建构活动。对这一理解实践的新思路, 劳斯在《作为生态位建构的社会实践》中通过四个命题进行了深入阐发。劳斯试图论证如下观点: 实践不是外在于自然的人类活动, 实践时刻保持着一种自然“亲密性”。劳斯的亲密性概念可以借助杜威的“交互作用”来理解。亲密性用交互作用视角代替关联主义视角去理解人类社会性实践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借此, 实践被置入自然之中。

关键词: 约瑟夫·劳斯 实践 生态位建构 自然文化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practice appealed in the practice turn in the 20th century has the following problems: Practice is regarded as social practice external to nature, and it is unable to account for its own maintenance and differentiation. Niche construction theory provides a mutual-constructio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between organisms and the environment, which inspires us to understand practice as some kinds of mutual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the environment. Regarding that understanding of practice, Joseph Rouse elaborates it in depth through four propositions in *Social Practices as Biological Niche Construction*. Rouse attempts to demonstrate the following viewpoints: Practice is not a human activity external to nature; rather, practice always maintains some kind of “intimacy” with nature. Rouse's concept of intimacy can be understood through Dewey's “tras-action”. Intimacy employs the perspective of tras-action rather than interrelationist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practices and nature. By this means, practice is placed within nature.

Key Words: Joseph Rouse; Practice; Niche construction; Natureculture

中图分类号: Q14; N031 DOI: 10.15994/j.1000-0763.2025.09.007 CSTR: 32281.14.jdn.2025.09.007

对实践的哲学思考由来已久。作为实践哲学的创立者, 亚里士多德曾将人类活动分为理论 (theoria)、实践 (praxis) 和制作 (poiesis)

三类, 此即所谓“古典三项”。到中世纪时期, 实践概念一方面把原本属于制作的机械技艺包括在内, 另一方面又把自身定位为理论的应用。

收稿日期: 2024年11月18日

作者简介: 杨思问 (1993-) 男, 河北邢台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科学实践哲学和实用主义科学哲学。Email: thinkinyang@163.com

张毓芳妃 (1992-) 女, 吉林吉林人,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科学实践哲学。Email: 1109447107@qq.com

[1] 因此, 古典三项逐渐被理论和实践的二分所替代, 而且理论处于优于实践的地位, 此即传统哲学的“沉思传统”。现代科学的发展使以往被忽略的“制作”活动变得越来越重要, 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就表达了理论活动和制作活动的紧密结合。理论活动需要依赖于实践和制作, 我们是在做中去知的。对此, 阿伦特有过精彩论述: 在现代, “制作和制造的活动——技艺人的特权, 首先上升到了从前由沉思所占据的地位”。[2]

在上述背景下, 20世纪思想界的“实践转向”(practice turn)是诸多反对沉思传统的进路集合, 由存在主义、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等进路奠基。尼克里尼(D. Nicolini)曾指出, 是马克思、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这三位哲学家拯救了实践被历史降级(historical demotion)的局面, 使其回到了讨论中心。[3] 虽然实践在这些哲学家那儿变得越来越重要, 甚至获得了本体论地位, 但实践本身仍然是一个极难获得公认定义的概念。夏兹金(T. Schatzki)就曾表示, 实践转向的动机和问题多种多样, 根本没有统一的实践进路。他同时发现, “许多研究实践理论的思想家认为实践在最低限度上是各种系列的活动。”([4], p.2)而且, “大多数理论家, 尤其是哲学和传统社会科学理论家把相关的活动确定为人类的活动。”([4], p.2) 实践被视为一种人类活动, 而且主要发生在社会领域, 实践与社会实践或者人类活动几乎成了同义词。

2023年下半年, 科学实践哲学代表人物之一劳斯(J. Rouse)出版《作为生态位建构的社会实践》一书。在此书中, 劳斯提出一种把实践理解为生态位建构(niche construction)的自然文化(natureculture)进路。劳斯发现, 20世纪实践转向的实践概念之所以面临重重困难, 是因为它被视为一个仅适用于社会领域, 而不适用于自然世界的概念。([5], p.25) 过去实践被理解为一个社会事件, 劳斯却提醒我们, 实践是一种自然进程, 要把实践置入自然内部。本文将首先分析实践转向的实践概念有何问题, 之后分析生态位建构理论对

实践的种种启发。

一、局限于社会领域的实践及其问题

在实践转向中, “实践取代心灵, 作为人类生活的中心现象”。[6] 但在特纳(S. Turner)看来, 甚至整个实践转向都是一次失败的尝试: 实践理论的吸引力部分在于它是失败解释的替代品。但它是一种可以用多种方式来构思的替代品。[6] 究其原因, 是哲学家往往对实践委以奠基重任, 把实践视为整个哲学出发的基点。但是, 这种做法本身蕴含矛盾: 一方面, 实践本身的多义性使它无法被清晰规则所说明。另一方面, 担当奠基重任的实践又迫切需要被清晰说明。

面对这样的矛盾, 哲学家往往倾向于采用不同方式把复杂实践给简化。特纳曾在《实践的社会理论》一书中, 把哲学家分析实践的种种方式区分为两类, 前者包括框架、世界观和范式等, 后者包括习惯、具身知识、技能和习俗等。[7] 后来他又以社会和认知作为分类标准, 把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置入一个四分框架中。[6] 特纳发现, 位于四分框架中的所有解释方式都无法应对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 超个体性(supra-individual)问题, 即依赖个体心理过程的实践如何实现集体性运作; 其二, 同一性问题, 即实践着的个体死亡之后实践传统如何得到延续。[6]

特纳因此诉诸一种“后古典实践概念”。[6] 传统实践理论往往预设一个先验前提, 人们之所以能够共同参与实践, 是因为共享这一前提。后古典实践概念放弃预设这样的前提, 它实现了这样一种翻转: 把传统实践理论用来解释实践的材料当作需要被实践本身所解释的东西。在后古典实践概念中, 我们无法诉诸社会结构、框架范式或习俗技能这些先在的东西对实践给出说明。这意味着, 如果局限于社会领域, 对实践给出清晰和明确的定义是不可能实现的。

劳斯提出的“规范的实践概念”被特纳视为后古典实践概念的代表之一。劳斯认为规范性与实践二者互相解释, 规范性来自实践者之

间的互相规范。规范的实践概念具有三个特征：其一，实践的边界由行为相关性划定。其二，实践包含对实践者来说未定的（at issue）和重要的（at stake）问题。其三，实践不只是社会的，更是因果的和物质的。^[8]笔者认为，劳斯在《作为生态位建构的社会实践》中对实践的理解，是对其早期“规范的实践概念”之延续。他对实践所面临的困难进行的分析可以被重构如下：

问题1. 实践转向发现了实践的重要性，但把实践局限于社会领域。

这一问题与“规范的实践概念”的第三个特征高度相关。其背后潜藏着这一追问：“实践是只涉及人们的言行和表现（performance）之间的关系，还是同时包括人们的言行所发生的物质环境？”（[5]，p.32）劳斯提醒我们，即使不少实践转向的哲学家承认社会实践有物质性基础，他们仍然在自然因果和社会实践之间做出了区分。（[5]，p.32）实践依然被视为局限于社会领域的人类活动。

问题2. 这种实践概念不能说明实践是如何被维持，以及如何分化的。

这一问题综合了规范实践概念的特征一和特征二。实践在变化和迭代，诉诸不随实践变化的社会要素来解释实践是不可行的。一种合理的实践概念需要解释实践本身是如何维持和分化的，这和实践如何理解、吸收之前的表现高度相关。因此劳斯也把这一问题表述为“表现如何从属于实践”。（[5]，pp.35-40）演化视角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实践如何维持和分化。

问题3. 这种实践概念预设了自然与社会的二元论，认为实践仅仅在接口（interface）处与自然相关联。

这—问题是问题1和问题2导致的后果。实践被置于自然外部的后果是，“人类动物性的生物学概念，以及对如何共同生存、相互理解、彼此批判的社会、心理或政治解释，很大程度上是在相互孤立的情况下进行的”。（[5]，p.1）自然和社会成为理解人的两个独立系统，它们仅仅在接口处互相关联。生态位建构启发下的实践概念有望对上述三个问题进行

回应。

二、生态位建构理论对理解实践的启发

演化生物学的最新进展提供了一个理解实践的思想工具——生态位建构理论（niche construction theory, NCT）。学者凯勒（E. F. Keller）把20世纪称为“基因世纪”，^[9]而把21世纪称为“超越基因世纪”。^[10]生态位建构理论从远超基因的视角出发来理解人与环境的相互建构（mutual construction）式演化。作为对现代综合进化论（modern synthetic evolution, MSE）的补充，NCT有望促进对人类诸多实践成就的理解，这使它成为理解实践的一个重要抓手。

在生态学中，生态位（niche）被用于描述不同有机体所占据的选择性环境，往往由猎物、栖息地等多种要素构成。列万廷（R. Lewontin）早在上世纪就发现，有机体并非被动适应环境，而是主动去改造、建构环境，这被视为生态位建构思想的萌芽。^[11]奥德灵-斯密（F. Odling-Smee）首先把生态位和建构两个词结合，提出生态位建构概念。^[12]在代表性著作《生态位建构：进化中被忽略的进程》中，奥德灵-斯密等学者进一步提出“生态位建构应该被视为（除自然选择外的）第二大进化参与者”，它是一种“有力的进化动因（agent）”。（[13]，p.12）这种理解方式意味着：生态位建构和自然选择一样，是进化图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蚯蚓疏松土壤、鸟儿建造巢穴、人类发明器具，这种种生态位建构活动都显著改善了有机体面临的选择压力。

相对MSE来说，生态位建构活动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和变革意义。笔者把这种补充和变革总结三个方面。第一，MSE把进化理解为有机体朝向环境的单向适应式演化。与之相对比，NCT认为我们应该采取一种有机体与环境之间双向建构的演化视角。从这个角度来看，MSE只描述了进化图景中环境影响有机体这一层面，NCT则把有机体对环境的影响补充进完整的进化图景中。^[14]第二，MSE认为

起遗传作用的主要是基因,具有很强的基因中心主义(gene-centrism)倾向。与之相对比,NCT认为有机体对环境的改造会通过生态遗传(ecological inheritance)传递给后代,因此环境也具有一定的遗传功能。^[15]第三,MSE往往把有机体视为被自然选择解释的对象和客体,某种程度上忽视了有机体的能动性。与之相对比,NCT把有机体视为进化过程中的能动者,把其对环境产生的影响视为影响进化动力学的关键因素。

NCT的启发性在于,实践应该被理解为生态位建构活动。对此,我们可以借鉴劳斯的思路进行解读。他赋予生态位建构以一种“在先”意味,认为有机体是具有生态位建构(niche-constitutive)性质的。有机体可以获得更多资源从而进行正生态位建构,也可能使自己面临更大选择压力而进行反生态位建构,但永远无法在非生态位建构条件下存在。生态位建构是普遍而非孤立的,是必然而非偶然的。([5], p.70)它不是某些聪明物种或者大型种群的特权,而是有机体存在的前提。在这个意义上,有机体的一切行动、实践都指向某种生态位建构,实践就是一种生态位建构。

在MSE和NCT的启发下,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人类与环境(或者自然)的关系角度,引申出对实践的两种理解方式。阐明二者的区别有助于澄清当前对实践的误解:

理解1. 实践是一种人类活动,它包括人类对环境施加的一切活动。

理解2. 实践是生态位建构活动,它包括人类和环境之间的一切相互建构活动。

笔者认为,理解1和MSE一样没有对称地去考虑人类和环境。如果说MSE过于重视环境,那么理解1则过于重视人类——如同在实践转向中所发生的那样。这对应着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实践概念。与之相对比,理解2对称性地考虑了人类和环境:实践意味着人类与环境在相互建构中实现新关系。理解1把实践限定在人类行为或社会领域中,理解2则把实践置入自然之中。接下来本文将借鉴劳斯的相关思想对理解2进行阐释。

三、自然文化进路:把实践置入自然中

上述把生态位建构视为实践的进路,被劳斯称为自然文化进路。这一进路首先受到塞尔(J. Searle)的社会哲学(philosophy of society)之影响:一种社会哲学要承认社会生活是自然世界的一个部分,并为将来服务,而不仅仅对过去进行阐释。^[16]戈弗雷-史密斯(P. Godfrey-Smith)的“自然哲学”也对此有所启发:“一个好的自然哲学做出的断言,必须与科学的断言相一致。”^[17]在此基础上,劳斯借鉴哈拉维(D. Haraway)的自然文化(natureculture)概念,把定义实践为生态位建构活动的进路称为自然文化哲学。([5], p.4)此进路可以把实践定位在更具包容性的自然文化领域,从而把实践置入自然之中。

第二部分提到,理解2认为实践是人类与环境之间的一种相互建构活动。这种互构不是发生在自然外部的,而是内在于自然的。自然文化进路的核心,就是把实践置入自然之中。与之相对比,把实践限制在社会领域有点人类中心主义倾向(对应于第二部分的^{理解1})。爱泼斯坦(B. Epstein)的评论有其道理:“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对社会世界(social world)的看法过于以人类为中心(anthropocentric)。^[18]皮克林(A. Pickering)也提醒我们:“大多数传统的社会学理论是人类主义的,主要的原因在于关键概念被置于特殊的人类领域之中。”([19], p.188)劳斯的自然文化进路提出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式实践的四个命题。

命题1.“人类是这样一种有机体,它的身体能力(bodily capacities)、实践方向(practical orientations)和持续存在(continuing existence)都不断以各种方式与生态环境纠缠,与人类谱系进化纠缠,与个人发展纠缠。”([5], p.14)

与石头、空气不同,有机体并不是单独存在物。一旦离开环境,我们就无法理解有机体的一切行为。劳斯也在这个意义上提醒我们:“生物体是作为一个活体,而不是一具分裂尸体

存在的。”([5], p.14) 有机体与石头、空气的差异,并不只在于它实现了身体内部各处的一种极强关联,而且在于把这种极强关联延申到环境中。“生命”一词并不指向有机体的身体,而是指向身体与环境的互构这样一个进程。梅洛-庞蒂对此有过精彩分析:“身体是在世界上存在的媒介物,拥有一个身体,对一个生物来说就是介入一个确定的环境,参与某些计划和继续置身于其中。”^[20] 有机体的身体不是“位于”环境中,而是“居住”于环境中。后者强调有机体与环境的紧密交互,比如:身体从环境中吸收所需物质,并把废物排泄到环境中。皮肤并非有机体的界限,我们并不在“皮肤”内,而是在“环境”内。甚至可以说,有机体就是环境,它的身体、能力、实践等都是内在于环境的。

命题2.“人类的生活方式与其他有机体最为常见的区别,源自于在不同环境下的协同进化。这世代影响着人类的发展。”([5], p.14)

人类的独特之处并不在于他逃离了环境,而在于他生活在一个独特环境中。如劳斯所指出的,这里的环境一词并不指物理意义上的周围环境,而是指生物学意义上的选择式环境。后者包括了一切会对生物产生影响的要素。([5], p.14) 在生态位建构过程中,人类重塑了自己的选择式环境。人类驯化、培育其他有机体,重新配置生态系统,这有效降低了人在环境面前的脆弱性。由克鲁岑(P. Crutzen)提出的人类世(Anthropocene)概念把人类力量视为能引起地壳和地表变化的“地质营力”(geologic agents),这体现了人类对环境的巨大建构性作用。^[21]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实践能力并非独立于环境,又施加于环境的。相反,它必须借助于环境才能实现,是内在于环境的“环境式”实践能力。劳斯也提醒我们:“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协同并不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交互世界,而是加强了对生态环境其他方面的依存。”([5], p.15)

前文问题1提到,实践被局限于社会领域。在命题1和命题2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这样回应问题1:

回应1. 作为人类和环境之间的一种相互建构活动,实践不只发生在社会领域,而应该被置入自然之中。

虽然人类实践和其他有机体的行为一样,是内在于自然中的,但这种实践毕竟有不可替代的独特性。置入自然中的实践概念需要解释这种独特性何以可能,劳斯诉诸命题3和命题4进行说明。

命题3.“多样但相互依存的实践是人类发展和环境选择的独特形态。”([5], p.15)

人类的独特实践形态源自一系列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实践。人类进化出一种更与众不同的新实践形式,实现了语言、概念、知识这些特殊的实践成就。人类实践变得广阔而且深入,劳斯说这种实践是“在空间上散布(spatially dispersed)、在时间上延展(temporally extended)”的。([5], p.15) 这种独特的实践方式并非“自主性实践”之结果,而是种种“依存性实践”之结果。人类能力的提高并不意味着人类不再依存于自然、其他有机体或者物质性要素,相反这种依存度变得变高了。NCT表明,人是在重塑自然的过程中重塑自己的。是自然、其他有机体和物质性要素促成了人的特殊实践,也是它们使人成为人。人类实践的独特性在于它更深地内在于自然(即实现了与各种要素紧密的相互依存),而不在于它成了一种外在于自然的社会性实践。

命题4.“人类实践差异化的生活方式在横向和纵向(horizontally and vertically)都有表达,而且被这些差异形式中的动态依赖所塑造。”([5], p.18)

作为自然进程的实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时刻处于变动之中。实践的变化被劳斯称为“实践差异化”(practice-differentiated)。劳斯用“方向”作为隐喻来表达实践的分散和延展。横向差异化主要是指人类与其他人、有机体和环境所进行的交互。在横向差异化中,一种耦合关系往往取决于各要素的一致性。这种横向差异化将在实践的发展历程中(时间中)逐渐变化,从而形成实践的纵向差异化。实践的纵向差异

化发生在人或有机体的整个生命历程中。横向与纵向差异化实践彼此交织,使得人实现了全新的实践方式。虽然劳斯把实践分为横向和纵向的做法略显粗糙,但是成功借此表明实践差异化的动力源于自然内部的交互。

前文问题2提到,实践转向诉诸的实践概念无法说明实践本身的维持和分化,在命题3和命题4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这样回应问题2:

回应2. 实践的维持和分化是实践横向和纵向差异化的结果。人类的独特实践方式源自其独特的生态位建构。

以上四个命题构成了自然文化进路的基本结构。虽然劳斯并未直接区分理解1和理解2,但自然文化进路实际上是对理解2的具体化:实践不只是人类对环境的改造,而且是人类和环境的互相建构。实践意味着实现人类与环境之间的新关系。一旦这样理解,我们会发现实践成功地被置于自然之中了。实践不是关于自然的人类活动,实践具有一种自然亲密性。

四、实践的自然亲密性

杜威曾在《经验与自然》中对经验的遭遇做出如下判断:经验不只被视为外在于自然的东西,而且还成了把自然遮蔽起来的帐幕。^[22]人类中心主义的实践概念也面临相似困境:种种差异化的实践使其被理解为一种外在于自然的的活动。具体来看,语言实践、伦理实践、政治实践等相当不同的实践方式涌现出来。它们无法被还原至自然,以至于看上去就像外在于自然一样。本部分将要论证,就像杜威的经验概念能通往自然深处一样,生态位建构视角下的实践概念是位于自然深处的,实践始终保持着一种自然亲密性。

种种复杂性社会实践确实无法还原到自然上,这并不意味着实践可以从自然中分解出来。劳斯提醒我们这种分解永远只是“接近的”,而非完全的。因此他把不同的实践活动称为“接近可分解系统(nearly decomposable systems)”。([5], p.119)整个社会实践场域其实就是一个大型接近可分解系统。一旦我们

认为可以把社会从自然中完全分解出来,就犯了“关联主义”(interrelationist)错误。何为关联主义错误?豪格兰德(J. Haugeland)指出,“关于精神对身体和世界的依赖的关联主义解释,保留了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原则性区别”。([23], p.208)也就是说,关联主义认为不同实践系统之间原则上可以完全分解,它们彼此之间通过接口互相关联。

为反对关联主义,豪格兰德诉诸一种亲密性(intimacy):“亲密一词不仅意味着必要的相互关联或相互依存,而且意味着一种精神、身体和世界的混合或整合,也就是说,要破坏它们各自的独特性。”([23], p.208)劳斯非常重视豪格兰德的这一阐释,他发现这与生态位建构视域下的实践概念有一种平行关系:“豪格兰德主张心理、身体和世界的认知亲密性;我主张人们与他在生物环境中相互依存的实践亲密性。”([5], p.126)NCT中有机体和环境的互构关系呈现出亲密性特征。与此相似,实践与自然的亲密性意味着它们不只通过接口发生关联,社会实践亲密地内在于自然世界中。

可惜的是,劳斯在著作中并未对亲密性进行细致阐释,因此我们需要仔细探究这一概念。亲密性源自拉丁语“intimus”,意为最内在和最深处(inner or inmost)。^[24]日常语言中,亲密性常表示人与人(比如母亲与婴儿、热恋的伴侣、知心的朋友)之间的亲近状态。此时“我”与“你”的界限含糊,成了一个整体。作为重要的心理学概念,亲密性也得到法国哲学家巴塔耶(G. Bataille)的关注,他认为亲密性如同“水在水中”(water in water),^[25]并指出在亲密性中根本不存在主体和客体。^[26]从这个角度看,实践的自然亲密性表明实践是自然进程的组成部分,类似水中之水。这意味着实践时刻对自然保持开放,社会并非实践发生的独立场域,实践的根深扎自然之中。

在这种解释下,笔者认为实践的自然亲密性支持后人类主义的实践概念。如前所述,传统实践概念过于以人类为中心。皮克林因而提醒我们不能依据人类的各种要素去解读实践,而要在与物质世界的斗争关系当中去思考其形

成。当然,我们更不应该在脱离人类的反人类主义(antihumanist)视角去解读实践。我们需要一种后人类视角,这是“一种从开始就认识到物质力量与人类力量相互间构成的理论”,([19], p.188)我们需要“特殊关注人类与非人类的相互交织——不仅有主体对客体的建构,而且还有客体对主体的建构”。([19], p.189)把实践理解为一种生态位建构活动,这削弱了对人类力量,诸如规则、理性、利益的依赖。同时,这加强了对自然本身的依赖——实践被视为人与物、人类与环境互构的产物。换句话说,这使得实践变得与自然更加亲密了。

强调实践的自然亲密性,其意义何在?在笔者看来,亲密性用一种杜威意义上的交互(trans-action)关系代替了上文提到的关联关系(已有学者指出:生态位建构理解有机体与环境互构的方式,应该在杜威所阐述的交互作用意义上来理解)。[27]在杜威看来,人类知识的进展伴随着三种对作用的理解。([28], pp.85-92)第一种是自作用(self-action),认为事物靠其自身力量来行动,这种理解方式从古希腊持续到中世纪。第二种是相互作用(inter-action),认为事物与事物在因果连接中实现平衡,这种理解方式开始于牛顿力学。杜威从达尔文进化论和爱因斯坦相对论中获得启发,提出第三种作用方式:交互作用。由“trans-”这一前缀即可发现,交互作用强调作用过程对双方改造和重塑。交互作用不会将交互原因归结为其他独立实体,也不会预设一些可分离的最终实体,任何实体都是交互的产物。

从这个角度看,关联主义是“相互作用”视角的产物。亲密性不是“关联”,而是“交互”。A和B之间保持亲密性,这意味着A和B不是相互作用着的两个实体,而是交互作用着的一个整体。A和B将在这种亲密交互中被改造和重塑。人类中心主义式实践概念把实践限定在社会层面,这其实是相互作用这种理解方式的必然结果。杜威发现,在自作用转换为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所有曾经栖息于物质部分的幽灵、仙女、本质和实体现在都逃往了新的家园,这些新的家园主要是在每个人的身体之中,特

别是在人脑中”。([28], p.104)也就是说,在相互作用视角中,行动和实践能力被限定在人类身上。杜威提醒我们,这种被放置到人类中的实践能力,其实就是昔日自作用中的“灵魂”,“只是它的不朽性被剥掉了,变得日渐干燥和反复无常”。([28], p.104)

所以,亲密性用理解实践与自然的交互作用视角取代关联主义视角。人类实践并不是外在于自然又施加于自然的,而是在自然内部并通过自然实现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非“越实践越远离”,而是“越实践越亲密”。实践不是遮蔽在人和自然之间的帐幕,人类的实践越差异化、越丰富,意味着人在自然中居住得越“深”。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这样回应问题3:

回应3. 把实践置入自然中,意味着放弃社会实践仅在接口处与自然相关联这种二元论立场。社会实践始终具有一种自然亲密性。

结 语

劳斯的自然文化进路把实践理解为一种生态位建构,这是对劳斯2015年的著作《阐明世界》的延续。劳斯成功把生态位建构的解释范围从“概念理解”(conceptual understanding)扩展到社会实践,继而扩展到全部实践。这为劳斯的“彻底自然主义”(radical naturalism)找到了一条更清晰的路径:语言、概念、实践的自然化意味着把它们置于生态位建构中去理解。具体来看,把实践置入自然中的自然文化进路在以下几个方面重构了我们对实践的理解(对应于上文中的三个回应):首先,实践不只是一种人类活动,而是一种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建构活动,也就是杜威所说的交互作用。其次,人类差异化的实践是在自然中实现的,我们独特的实践方式源自独特的生态位建构活动。最后,社会并不是实践发生的独立场域,自然和社会并不是两套关联着的系统,社会实践始终保持一种自然亲密性。

这种重构意义何在?其一,它有望为打破自然和社会两大领域的分裂局面提供一个支点。虽然自然文化进路能否实现二者的整合还有待

考察,但把社会实践置入自然中这种理解方式提供了一个值得继续探索的进路。其二,把实践理解为一种生态位建构,这有望成为科学实践哲学的一种新思想资源。科学实践不是一种表征自然的社会实践,而是发生在自然内部的互构性实践。科学实践的成就不只体现为如何借助社会要素来理解自然,更体现为它如何重构了这个世界。由此来看,劳斯的自然文化进路仅是一个起点,生态位建构理论重构哲学问题的潜能值得持续深入探究。

[参考文献]

- [1] 郁振华. 论哲学中的实践转向[J]. 学术月刊, 2023, 55(12): 5-15.
- [2] 阿伦特. 人的境况[M]. 王寅丽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232.
- [3] Nicolini, D. *Practice Theory, Work, and Organization: An Introduc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40-41.
- [4] 夏兹金. 导言[A], 夏兹金、塞蒂纳、萨维尼: 当代理论的实践转向[C], 柯文、石诚译,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0, 1-16.
- [5] Rouse, J. *Social Practices as Biological Niche Construction*[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3.
- [6] Turner, S. 'Practice Then and Now'[J]. *Human Affairs*, 2007, (2): 110-125.
- [7] Turner, S. *The Social Theory of Practice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 [8] Rouse, J. 'Social Practices and Normativity'[J].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2007, 37(1): 46-56.
- [9] Keller, E. F. *The Century of the Gen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10] Keller, E. F. 'The Century Beyond the Gene'[J]. *Journal of Biosciences*, 2005, 30(1): 3-10.
- [11] Lewontin, R. 'Gene, Organism and Environment'[A], Bendall, D. S. (Ed.) *Evolution from Molecules to Men*[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273-286.
- [12] Odling-Smee, F. J. 'Niche Constructing Phenotypes'[A], Plotkin, H. C. (Ed.) *The Role of Behavior in Evolution*[C], Cambridge: MIT Press, 1988.
- [13] Odling-Smee, F., Laland, K., Feldman, M. *Niche Construction: The Neglected Process in Evolution*[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 [14] Day, R. L., Laland, K. N., Odling-Smee, F. J. 'Rethinking Adaptation: The Niche-Construction Perspective'[J]. *Perspectives in Biology and Medicine*, 2003, 46(1): 80-95.
- [15] Odling-Smee, J., Laland, K. N. 'Ecological Inheritance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What Are They and How Do They Differ?'[J]. *Biological Theory*, 2011, 6(3): 220-230.
- [16] Searle, J. *Making the Social World*[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5.
- [17] Godfrey-Smith, P. 'On the Status and Explanatory Structure of Developmental Systems Theory'[A], Oyama, S., Griffiths, P., Gray, R. (Eds.) *Cycles of Contingency*[C], Cambridge: MIT Press, 2001, 283-97.
- [18] Epstein, B. *The Ant Trap*[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7.
- [19] 皮克林. 实践与后人类主义[A], 夏兹金、塞蒂纳、萨维尼: 当代理论的实践转向[C], 柯文、石诚译,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0, 187-199.
- [20] 梅洛-庞蒂. 知觉现象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116.
- [21] Crutzen, P. 'Geology of Mankind'[J]. *Nature*, 2002, (415): 23.
- [22] 杜威. 经验与自然[M]. 傅统先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1.
- [23] Haugeland, J. *Having Thought*[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24] Sexton, R. E., Sexton, V. S. 'Intimacy'[A], Fischer, M., Stricker, G. (Eds.) *Intimacy*[C], Boston: Springer, 1982, 1-20.
- [25] Bataille, G. *Theory of Religion*[M]. Hurley, R. (Trans.) New York: Zone Books, 1992, 19.
- [26] Tomasi, A. 'Technology and Intimacy in the Philosophy of Georges Bataille'[J]. *Human Studies*, 2007, 30: 411-428.
- [27] Kivinen, O., Piironen, T. 'Updating Dewey's Transactional Theory of Action in Connection with Evolutionary Theory'[A], Morgner, C. (Ed.) *John Dewey and the Notion of Trans-action: A Sociological Reply on Rethinking Relations and Social Processes*[C], Basel: Palgrave Macmillan, 2020, 195-222.
- [28] 约翰·杜威. 认知与所知[M]. 汪洪章等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责任编辑 李斌]